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王浦劬主编

民主与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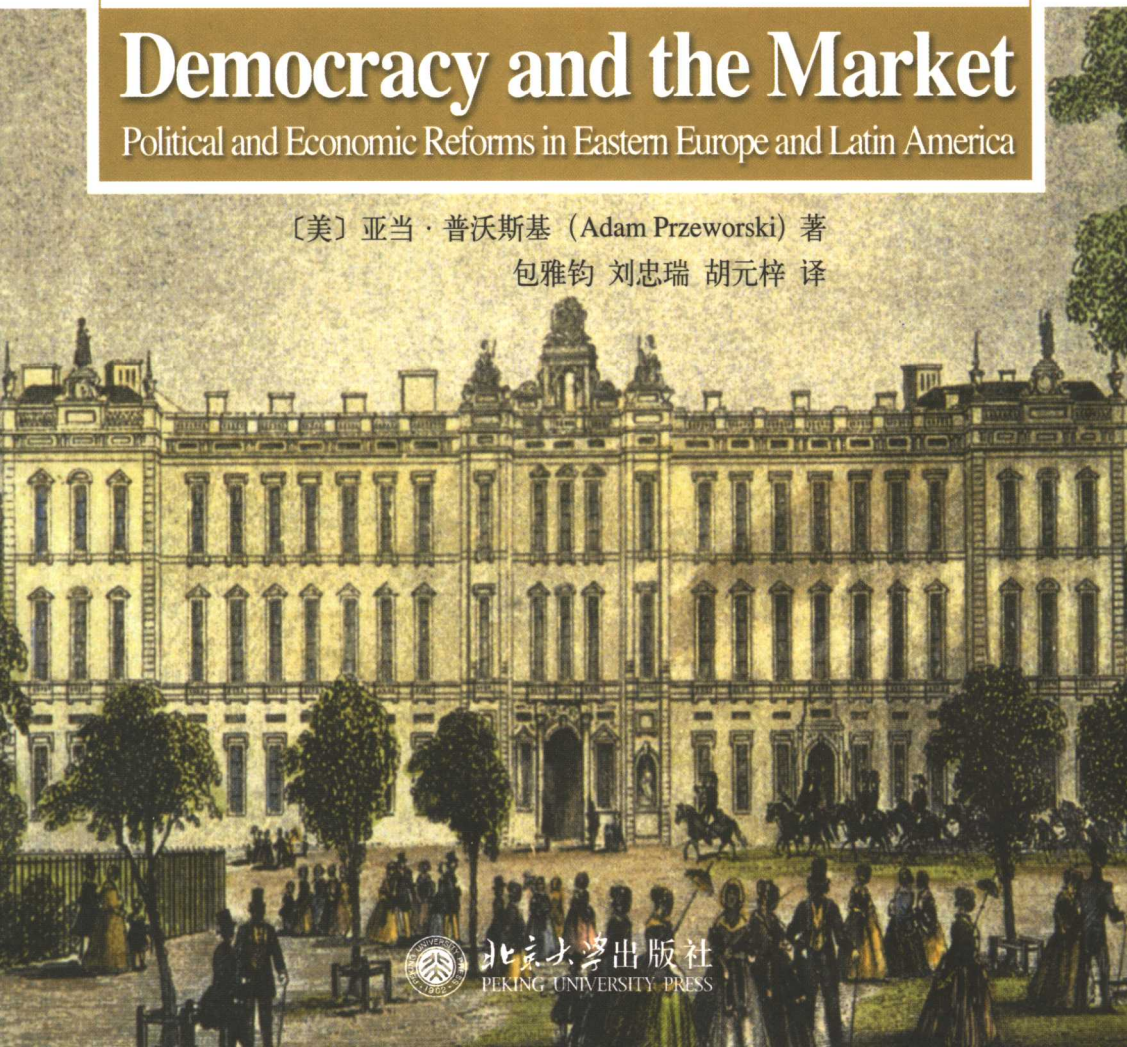
——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美〕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著

包雅钧 刘忠瑞 胡元梓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

民主与市场

——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美〕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著

包雅钧 刘忠瑞 胡元梓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4-56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市场: 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美)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

ISBN 7-301-08613-X

I. 民… II. ①普…②包… III. 政治民主—关系—经济发展—研究—发展中国家 IV. D501②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3109 号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by Adam Przeworski

Originally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authorized to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著作责任者: [美]亚当·普沃斯基 著

包雅钧 刘忠瑞 胡元梓 译

责任编辑: 周 菲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13-X/D·107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25 印张 205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简介

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教授，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1966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与纽约大学，到瑞士、德国、法国、智利、印度、波兰等多个国家做过访问学者。学术研究成果斐然。除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外，普沃斯基教授还独著、合著或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如《民主、责任与代表》、《可持续性民主》、《资本主义下的国家与经济》等，许多著作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汉语、土耳其语等多国文字。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已出书）：

- 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卡列维·霍尔斯特）
-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亚当·普沃斯基 著）

责任编辑：周 菲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tel:19051363823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浦劬

副主编 燕继荣 高鹏程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方向勤 王 欢 王 清 王浦劬

邓名奋 包雅均 刘海波 吕文栋

孙朝阳 朱 宁 朱唏颜 李风华

李玲玲 祝灵均 胡元梓 胡宁生

高鹏程 燕继荣

译丛总序

王浦劬

政治学科是以研究公共权威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基本任务的学科。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学科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因此,根据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我国政治学科的学科发展逻辑,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政治学的研究,是我国政治学科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政治学研究,可以按照不同的要求,进行不同内容、方式和角度的研究。在这其中,了解和把握西方政治学科的代表理论、方法和观点,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正确批判其价值立场和观点,合理吸收其有益知识和方法,是深化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且不可回避的途径。正是由此出发,我们组织翻译出版这套《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以期作为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政治学代表理论、方法和观点的初步工作,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分析、正确批判和合理吸收其内容的基础工作。

在西方,作为独立学科专业的政治学科产生于19世纪末,其标志是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创立。学者常常以此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现代西方政治学,即是1880年以来的西方政治学,因此,这套《现代政治学名著译丛》的作品选择,基本以此作为时限范围。

我国政治学科1980年恢复重建以来,在了解和把握现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面作了重要努力,这一时期若干重要著作的移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的作品,对于我们科学准确地把握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而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于我国政治学科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途径的选择,都起到了富有意义的作用。与此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些译作比较更多地集中在20世纪20—70年代的西方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方面,而对于同一时期西方政治学其他领域比如政治哲学、政治制度研究、政治经济研究、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等的译

作较少。而有关西方政治学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作品的译作,亦相当零散而缺乏系统性。这就使得人们难以比较全面地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原貌和全貌。有鉴于此,这套译丛试图在已有译作的基础上,选择尚未移译的西方现代政治学的代表作品,尤其选择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重要作品,与已译作品形成互补,以求显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状况。这一意图,可以看作是这套译丛的选材原则。

自形成独立的学科专业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等西方社会科学主导方法的影响下,现代西方政治学与古典西方政治学、近代西方政治学相比,在学科框架、研究对象、研究层次、研究途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时至今日,按照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政治学手册》(*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ited by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ter Klingeman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现代西方政治学基本学科框架由八个领域或者八个分支构成,即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政治行为(Political Behavior)、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政治学方法论(Political Methodology)。因此,这套译丛选材的学科范围,基本是以此为参照进行的。

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看,所谓“名著”,通常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特质:其一,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推进学科和专门领域研究的贡献和功能;其二,在其发表的年代,具有公认的重要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其三,经过社会历史和学术发展的检验,披沙见贝,留诸史册,传之后世。就此而论,将“现代”与“名著”结合,至少在经过历史检验的意义上,似有不妥。因此,虽然这套译丛冠之以“名著”,但实际上也就仅仅是从现代西方政治学“代表作”的意义上确定的。而译丛选择“代表作”的标准,基本是以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政治学手册》中有关现代西方政治学中多被引用作品和作者的统计为依据的(pp. 28—32)。

由于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在价值观念、制度环境、研究对象、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与我国社会政治和政治学科的巨大差异,因此,在了解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给予科学的分析、批判、扬弃和合理吸收,是我们研究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出发点,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无疑有着更加长远深入的研究工作需要开展。值此译丛出版之际,仅以此与学界同行共勉之。

译者前言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是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之一,现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于1961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获哲学与社会学硕士学位,1966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3年在华盛顿大学任教,1973年至1995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曾到瑞士、德国、法国、智利、印度、波兰等多个国家做访问学者,从事学术研究。除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外,普沃斯基教授还独著、合著或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本书即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民主与发展:1950至1990年间的各国政治体制与福利》(2000)、《民主、责任与代表》(1999)、《可持续性民主》(1995)、《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改革:社会民主之路》(1993)、《资本主义下的国家与经济》(1990)、《故纸堆:选举式社会主义的历史》(1986)、《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1985)、《社会科学的系统分析方法》(1975)、《比较社会调查的逻辑》(1970)、《波兰的地方政治》(1967)。其中的许多著作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汉语、土耳其语等多种文字。

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国家而言,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从总体上说,有冲突论、兼容论与怀疑论三种观点。冲突论认为,在这些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兼容论则正好与此相反,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政治民主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巩固政治民主。第三种则正好位于这二种极端观点之间。怀疑论认为,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两者之间既不总是处于冲突状态,也不总是处于协调状态。这种理论强调,在民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上,政治制度本身并非关键,人们必须重视向民主过渡的策略、条件与要求。政治民主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不稳定、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

诚如本书书名所言,民主与市场,研究的就是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迈向民主与市场的途中,会遇着什么样的结局?普沃斯基教授并

没有给出一个定论,相反,他以学者的认真与严谨,探讨的是向民主过渡的策略与条件。他所秉持的态度如上所言,正是一种怀疑,或者说是一种不安。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基调是低沉的。读者翻开这本书,您首先选择看的应当是普沃斯基教授自己所作的序言,他已经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这远甚于译者所能做的一切了。作者所强调的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相互依赖性,在分析中所引用的广泛的各方数据,运用的源于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一些模型,都将会给大家留下畅快淋漓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的价值并不因为它与经济改革、发展的复杂关系而黯然失色。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无人能阻挡。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人们不仅不应阻碍它,还应殚精竭虑,去倡导它、完善它。

通读全卷,普沃斯基教授所抱有的对民主的热爱,对各国人民福祉的关怀,跃然纸上。然而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盘否定,把共产主义在局部地区的暂时挫折看作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对于这种情况,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会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译者
二〇〇三年初冬于北京

导 论

财产权利与言论自由——使人免于饥饿，不受压迫：这些基本价值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一场对政治民主与经济理性的热切追求。过去的十五年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乌拉圭、韩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都举行了民主选举，这些民主选举若不是亘古第一回，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甚至在苏联，谨小慎微的初步政治解禁也引发出民众意愿的强烈表达，并把民主纳入了政治议事日程。这么多的国家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也从未尝试去建立民主制度。

同时，过去的几十年里，曾在某些国家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奏效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于是，我们看到，人们正在急切地寻求一种能保障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与新策略。许多国家的改革屡屡失败。现在，其整体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之中。

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试图同过去彻底决裂的种种努力。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过渡”一词最能描述它们政治经济改革过程的特征。这种过程就是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过渡，从各式各样的国家统治的、垄断的、封闭的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这两种过渡都是根本性的转变，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那些义无反顾地走上民主与市场之路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过渡研究的目的是要回答通向政治民主与物质繁荣的条件与途径等问题。过渡将结出民主之果？抑或重蹈或新或旧的专制之覆辙？新的民主会保持稳定吗？新的民主由哪些制度构成？新的政治体制在衍生实质性结果方面将卓有成效吗？它会促进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吗？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哪一种财产权形式将居主导地位？何种机制来配置资源？人们将寻求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体制会带来一种使人人都能享受物质安全的发展吗？ ix

对这类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社会科学家要知道得越多越好。然而要揣测未来，要理解当前我们面临的选择，我们就不得不事先作出种种假

设。具体说来,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四个关于民主与发展的问題。这四个问题似乎一直为人们所置疑。

1. 哪一种民主制度最有生命力?

2. 哪一种经济体制——财产权形式、资源配置机制、发展战略——最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

3. 经济体制的成功运作和所有人共享物质安全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

4. 巩固民主,使各团体为追求自身利益与价值不虞恐惧而又谨守规则地组织起来,这又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条件?

本书从东欧剧变开始。这个事件没有人预先料想到。但是,它却在短短几周之内为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民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这个新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国家会找到一条通向民主与繁荣、通向“西方”的平坦大道吗?或者他们将发现自己像亿万生活在“南方”的人民一样,正在不幸与压迫下苦苦挣扎?这是序言提出的问題。

第一章提出了持久民主制度的理论。我认为,唯有当民主能够唤起各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动地遵从民主制度时,民主才能长久存在。随后我阐明,为了唤起这种遵从,民主必须同时给所有这些力量提供公平的机会,使之能在制度的框架内竞争,并产生实质性成果。即民主必须是公平而有效的。然而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不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经济上进行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最符合这样的条件,使得民主更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即使能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也无法保证那些为了未来民主制度下的有利机遇而不断争斗的各派政治力量会采纳这样的民主制度。第二章一开始便谈到了权威主义政权的自由化,然后集中讨论向民主过渡进程中的制度选择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制度只能从谈判协商中产生。个别转型案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类协商是包括与先前权威政权有联系的力量,还是仅仅包括和权威政权作斗争的同盟者。“解脱”——通过与原权威政权谈判而达成的过渡——极有可能留下旧制度的印痕,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军队的自主权问题。然而,即使支持民主的力量不害怕受压制,当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新政权时,他们也是倾向于采用被其中的某些力量视为权宜之计的制度框架。因此,根本的制度问题不可能在过渡期间得到解决。最后我指出,如果制度问题一直在次要的政治冲突中彰显出来,那么意识形态的因素就会直接摆在人们面前。但是,许多新生民主政权中的主流意识

形态,无助于形成人们对内生于民主竞争中的分裂和冲突的宽容。

第三章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财产权形式和资源配置机制——最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我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独特的非理性:当自利的经济主体以分权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时,生产潜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除非各经济主体从其投入中获得完全的收益。但是,社会主义——通过集权命令配置资源——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有关计划者、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经不起检验的假设基础之上的。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我认为财产权形式远不及资源配置机制重要。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是这样的:它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要受到约束,由国家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最低限度的物质福利。这种体制可能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效率不高,也无平等。但是我不能找到比它更好的体制了。

即使我们知道哪一种经济体制最好,通往它的道路也必定充满曲折。第四章专门探讨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问题。我阐明,由改革带来的种种过渡性影响有可能包括通货膨胀、失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人们相对收入的变化无常。问题在于,这种转型成本在政治上是否能被容忍。通过采用一些简单的假设,我证明,能够起到最大推动作用且为政治家们偏爱的改革战略并不能使社会成本最小化。即使这种战略一开始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但是,当人们尝到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时,相应的政治对抗就会接踵而至。对此,政府开始在内生于市场取向的治理方式与用以维系政治支持的参与方式间摇摆。这种摇摆腐蚀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并有可能威胁到民主的稳定。 xi

上述预言暗示出本书的基调是冷静的,也许甚至是低沉的。正如波兰人所说,悲观主义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然而,我的用意不在于提供预言,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而是在于阐明民主建设与经济转型中的典型障碍。我相信,所有向民主过渡的国家都会遇到其中的一些障碍,因为它们虽起点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各个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结局不尽相同,因为这取决于各自天赋的历史条件、善良的意志、智慧与运气。 xii

引言

东欧剧变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南欧——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出现了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过渡。80 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部,除智利外,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也启动了民主化进程。随后,在东欧,1989 年秋天,它也隆重登场。我们能用前者的经历来解释后者吗?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尽管南欧与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在先,东欧各国的剧变仍然让人惊奇不已。因其坚不可摧,共产主义体制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极权主义模式。然而,谁也没曾想到,它竟然突然间和平地崩溃了。究竟是什么使东欧剧变成为可能?是什么使之如此迅速而又顺利?

既然把东欧剧变当作整个分析的“引言”,这决定了我要按自己的理解构建全文。不过,我们不能轻率行事。从 1989 年秋天来开展分析,在政治科学研究上必定会失败。关于东欧剧变的任何反思评论,不但要解释历史发展进程,还要弄清楚妨碍我们预见这些发展的理论假设。如果说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明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事先没想到呢?

大多数的癌症晚期患者都死于肺炎。相比起来,社会科学就不善于分析事物的深层原因和推动条件。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有关魏玛共和国覆灭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为什么东欧发生剧变”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于对“为什么它在 1989 年秋发生”的回答。解释东欧国家必然会发生剧变,比解释剧变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发生要容易得多。

“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不能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它无法诊断出癌症,也无法诊断出会导致肺炎的症状。极权主义模式远比它如此这般描绘的现实社会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该模式认为建立在意识形态与集权统治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存在冲突。然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用葛兰西的话说,意识形态不再是把社会黏合到一起的水泥了。记得 1964 年波兰五一节间的头条标语——“社会主义是国家的保证!”——让我多么吃惊!社会主义——一个全新的未来——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的了,相反,它成为捍卫传统价值的工具。到 20 世纪 70 年代,压制有所松缓:随着东欧国家共

产主义领导层的资产阶级化,他们无法严格要求自己以压制所有异端。党的官僚们晚上不开会了,不穿工人阶级制服,不参加游行,不喊口号;他们过上了奢侈的生活。随后出现的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卡达尔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它们都暗含某种社会契约:精英向大众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以换取他们的沉默。达成这种契约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不再是崭新未来的模式,而是别的一种不发达的事物。赫鲁晓夫把赶上英国作为苏联的目标。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欧成为比较的标准对象,而这种比较越来越使苏联和东欧国家感到羞耻。

在匈牙利和波兰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最后形成的是物质至上、原子化且玩世不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鼓噪着他们自己不相信的,也不指望别人相信的公式化语言。言论变成了一种仪式。我常常想起一个苏联笑话: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但被警察逮住。警察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警察惊叫起来,“你发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空白的,什么都没写!”得到的答案是“何必要写呢?大家都知道……”

言论变成一种危险。它甚至会变得足够危险,以至于1968年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援引的一条理由即是在布拉格出现的《二千字声明》。相比之下,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性”、“平等”甚至“工人阶级”这些观念最具有颠覆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波兰的调查就表明,工科学生在批评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最激进,而他们恰恰是浸淫理性价值的一群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策略来颠覆当时的政治体制。他们决定行使宪法宣称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不过对这个体制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工人阶级。该体制一直宣称代表着工人阶级从而获取自身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成为它指导下的社会秩序的威胁。人们需要保持某种认知的连续性,当他们的思想与言论脱节时,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此,要粉碎那种体制,呼唤“真理”就至少同争取面包一样重要;当体制摇摇欲坠时,历史就格外引人迷恋。因此,就有一位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反对派领袖出自国家档案馆主任,而高中历史考试则被暂停了2年。作家和知识分子成为后共产主义体制的领袖。

但是,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无需区分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还有些人认为,西班牙、希腊、阿根廷、巴西或菲律宾向民主的过渡为匈牙利、波兰和苏联提供了现成模式。他们都在寻找肺炎的症状,却没有诊断出癌症。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知道怎样去分析其动因,但不知道怎样分析引致爆发的条件。尽管阿什(Timothy Garton Ash)(1990:252)在1988年9月谨慎地写

到了苏联帝国“长凳化”——“因腐败而解放”的可能性，但是谁也没有察觉到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已经变得多么的脆弱，以至于它会一触即溃。

“东欧剧变”由一个或一个半事件引起。亨利·基辛格信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胜出了。他未能预料到的只是骨牌倒下的方向。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一切是由先前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引起的，而后者又是由东德垮台造成的。是匈牙利的政治变迁使东德民众走上街头，而波兰谈判的成功则为匈牙利人指明了出路。我知道，许多从事宏观历史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会写出成千上万的著作与文章，把上面所说的各个国家的背景条件与结局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认为，他们这样只是浪费时间，因为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雪球。从技术上讲，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有了发展，其他国家的人民成功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再随着下一个国家局面的改观，对最终的结局人们就会越来越有信心。我相信，最终所有的国家都会走上这条道路。 3

1976年波兰首次出现了公开反叛，并于1980年形成燎原之势。促使“东欧剧变”发生的第一例事件不是发生在1989年，而是要追溯到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动的政变表明，再也不能依靠民众的消极服从来统治了，权力必须以武力为保障。随着20世纪70年代波兰经济发展策略的失败，随着知识分子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工人接管了他们的工厂，党的官僚们再也无法维持他们的统治了。为继续享受特权，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政治体制，而动用了有组织的暴力压迫。统治军事化了，因为唯有如此，它才能在社会动荡中生存下来。

从那时起，只是由于人们对内部或外部有形暴力的恐惧，才使这个体制勉强支撑着。1988年夏天，工人再次罢工，这表明即使是暴力也不足以维持统治。幸好雅鲁泽尔斯基理解这一点。是军队促使波兰共产党同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在没有面临来自下面的压力、没有军队的干涉时，匈牙利共产党高层就已经分裂了。1989年春，波兰谈判成功，这为匈牙利人指明了一条权力和平交接的道路。在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官僚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还能保住手中的政治权力，那么，正如汉基斯所言，他们就会趁早把它“转变”为经济权力。

匈牙利人决定让东德难民过境前往西德。这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东德人了解到可以从布达佩斯到达西德之后，他们又尝试从布拉格是否能走得通。此时东德领导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同意让难民迁往西德，但决定要“侮辱”这些人。他们要这些人乘火车穿过东德，使之面受有组织的示威者的嘲弄。然而，民众非但没有谴责难民，反而把示威矛头直指

现政权。后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余的都已成为历史。一旦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莱比锡、德累斯顿、柏林的街头,一旦柏林墙倒下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受到了无法抵抗的压力,而匈牙利共产党人能做的也就只能是限制它们所带来危害的范围了。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革命,对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十分关键。但它仅仅是推动性的事件,是“肺炎”。不过,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

苏联干预的威胁,深烙于1956年匈牙利人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记忆之中,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仅是一种约束,是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里面的水就一泄而出。苏联的变化并没有推动匈牙利和波兰的转型,而只是清除了一直阻碍它们转型的关键因素。约束是外在的,而动力则是内生的。因此,“苏联因素”并不表示拉美模式对于东欧是无效的。

再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在回顾起来,很清楚,使东欧体制破裂的压力在苏联也同样存在。不能永远安抚与压制异端,不能使国民吃饱穿暖,对阿富汗山野部族束手无策,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呆滞落伍,——难道这不是1984年的苏联吗?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要是完整地列出这个清单,我们难道还得不出这种体制不能持续的结论吗?

1981年苏联本可以入侵波兰吗?苏联还可以维持它的帝国吗?它的国内和平与繁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我看来,苏联的变化,包括它对东欧战略态势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性的:即,它部分地是由于东欧的发展导致的,是由于维持帝国的政治经济代价越来越高导致的。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人,在过去都相信,如此重大的政治变迁肯定充斥着暴力。然而除了罗马尼亚和煽起民族主义狂热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外,在这场革命中没有死一个人。这是为什么?

东欧剧变发生得如此迅速平和,可以从意识形态与暴力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对我来说,与这场变革中最动人心的方面相比,最有意义的是,官僚们对保卫手中权力无话可说。他们只有沉默;他们再也不说什么社会主义、进步、未来、繁荣、理性、平等、工人阶级的口号了。他们只能计算一下,如果不让步的话,他们得打倒多少人;如果妥协,他们得让出多少内阁职位;如果屈服,他们还可保留多少工作岗位。他们最多只能宣扬一下爱国奉献精神,但是他们的信誉受到人们的怀疑。甚至到现在,当已改头换面或转型了的共产党宣称他们是忠于民主社会主义时,他们仍然是言不由衷地说:波